

對“第三共和國”的質疑

——與嚴家其、陳一諮商榷

問題的緣起

最近，在香港一些雜誌上，連續看到嚴家其、陳一諮等先生數篇論及“第三共和國”的文章。

嚴家其先生把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稱為“第一共和國”，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稱為“第二共和國”，而未來的民主中國——“中華聯邦共和國”則被稱為“第三共和國”。

按照嚴家其、陳一諮等先生的設想，未來的“第三共和國”將結束一黨專制，建立民主政治。他們認為這個目標，可以在一、二十年內實現。

中共國祚至少百載

如果歷史的發展真如嚴、陳等先生之預期，則全球炎黃子孫就要載歌載舞、大肆慶祝了。然而筆者卻認為，此種估計熱情有餘，理性不足，不乏政治家的鼓動，但缺乏歷史學的沉思。

這裏，想引述拙著《中國歷代之興治盛衰亂亡》（香港學津書店1989年出版）中的一段話：

“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乃繼漢、唐、明、清之後，中國歷史上的另一盛代。自十年前西單民主牆被‘鏟平’以來，乃至‘六四事件’前前後後，常有友人相與探討中共之國祚，筆者均毫不猶豫地答以‘至少百載’，其因無他，蓋縱比歷代、橫較列國故也。歷史上漢、唐、明、清等代國祚均數百年，現代雖有思想開放、信息靈通、國際影響諸條件，但打個對折自不少於一百年。”

這段話在該書的〈作者弁言〉中，寫於1989年11月15日，是全書出版前夕臨時加上的。今時過兩載，筆者仍堅持這樣的看法。需要解釋的是，所謂“百載”是從1949年算起；所謂“統治”是指一黨專政，但不排除如唐朝後期那樣，各地藩鎮割據仍奉中央之旗號。

歷史的道路

眾所周知，從事歷史研究並非當算命先生或預言家，不求事事應驗以示博學多才、善知過去未來。筆者之所以認為中國一黨專政將較長期地存在，乃出於一種“歷史”的感覺——正如嬰兒的成長深受孕育他的母體的影響一樣，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也無法擺脫其賴以成長起來的那個社會基礎和歷史傳統。古今中外的歷史應該進行比較性的研究，各國之間存有差距的“歷史道路”可以按年來計算，在沒有走夠一定的年頭是不會有歷史奇跡出現的。

綜觀世界各國資本主義取代封建的變革，其發生有先有後，歷程有長有短，規模有大有小，解決有快有慢，而差別程度則取決於各國舊有專制統治之強弱。饒有興味的是，以世界的地理位置來看，各國的封建專制由西而東，大致呈現愈來愈強的狀況，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進程，想應地也發生得愈來愈晚、時間愈來愈長、程度愈來愈烈、成功速度愈來愈慢。若舉大國為例，約有下列幾種典型：一、英美法：較早發生資產階級革命，實現兩黨制民主；二、德意日：採取自上而下的改良，中途出現法西斯統治，經過戰爭失敗的苦難歷程；三、蘇俄：以社會主義革命中斷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最先推行共產黨專政；四、中國：專制傳統冠於全球，以新式農民戰爭扼殺僅有一點民族資本主義，反封建專制的任務最為艱鉅。

倘若要用年頭來計算這一歷史道路，英國自1640年革命開始到1689年《權利法案》的通過，共花費了五十年，迄今已經有三百多年。法國由1789年革命開始到第三共和國建立，則經歷了八十六年，法國

大革命迄今不覺已過二百載。德國在1871年完成統一，但到最近的新統一，竟耗去了一百二十年。俄國從1861年農奴制改革迄今，經歷了整整一百三十年，結束一黨專政的問題才剛剛提上日程。至於中國呢？1949年完成的充其量是一次新式農民戰爭，對中國固有的封建專制傳統觸動不大。既然如此，它要像英、法、德那樣，又得經過多少年頭呢？

民主的到來

從英、美、法、德、意、日等國資本主義取代封建的歷史來看，自由、民主（指兩黨制）化的過程有一定的規律。首先是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為此對內往往通過自下而上的革命或自上而下的改良，解放生產力，用立法手段保障私有權；對外則發動殖民侵略或大規模戰爭，從事資本的積累。其次，進一步實行政治、法律諸方面的改革，保證建立最有利於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統治方式，從目前來說，各國均採用兩黨或多黨式的議會制。只有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才可能促進社會繁榮與文化普及，也才能為民眾提供較多的自由權利。

遍觀寰宇，凡是經濟較富裕的國家，其自由、民主化的程度也較高，二者相輔相成、互為正比。反之，貧窮愚昧同極權則成了一對孿生兄弟。在一個充滿文盲的農民之國度，要消滅官僚主義、實現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歷代均推行重本（農）抑末（商）政策。其小農經濟簡直如橫流恣肆的汪洋大海一般。在這種社會基礎上所樹立的政治制度，必然是專制獨裁的中央集權制。要實現人民民主，既要反對專制統治，又要消滅小農經濟。但欲鏟除封建專制盤根錯節的地基，往往需遷延時日，付出艱鉅的代價，經過苦難的歷程。

這樣說並非為“一黨專制”提供理論根據，只因它是歷史發展造成的國家、民族傳統。

中國的前景

中國民主化前景這個問題，不是簡單地預測一下時間就可演魔術似地解決的，而須對實現民主化的步驟方式、主要特點、前路困難及廣大民眾應取之態度，展開多層面的分析。這也不是靠一兩個領袖或若干學者的研究，就可迎刃而解，應該由海內外炎黃子孫集思廣益，共同進行探索。

拙以為，中國發展自由經濟，實現民主政治，大概不會採取英、美的模式，而只能走法、德、俄先後走過的老路，而且更曲折、更漫長、更艱鉅。這條“老路”即國家資本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用國家壟斷來補充私人資本發展的不足，使官僚階級及官僚主義大行其道。從這個意義說，中國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就是從前蘇俄列寧、斯大林的布爾什維主義，就是從前德國希特勒的納粹主義，就是從前法國拿破崙的波拿巴主義。

1989年民主運動的重要口號是反對“官倒”。“官倒”是社會主義制度下新官僚階級剝削人民的典型現象，自然非大反特反不可。反對官倒、爭取民主的鬥爭，正是上述國家不斷前進的動力。但從歷史發展的客觀進程看，“官倒”卻是一下打不倒的，即會長期存在的事物。也許會有“一部分”官僚“先富起來”，然後為了自己的利益再立法保護私有財產，等自己腦滿腸肥之後，再分一杯羹給其他的中產者。中國或者會經由這種不死不活、漫長痛苦的道路，一步步向前走去。

解脫的捷徑

前面提到的只是今後中國內部可能出現的狀況，也許等不到它把人折磨死就得另闢蹊徑。從歐美各國工業化的進程看，其資本積累的重要手段往往是對外戰爭。例如，大英帝國長期從事殖民戰爭，法國大革命後的拿破崙戰爭，德國與英、法等對仗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德、意、日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歷史證明，後進的國家為了加速本國經濟發展，與先進國家較一短長，通常總是優先發展軍事工業。從前德國如此，隨後輪到蘇聯、中國了。筆者在《中國歷代之興治盛衰亂亡》裏曾分析未來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是資本主義的美、英、法、德諸國和社會主義的中國，從東、西兩面夾擊蘇聯，猶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美、英、法和蘇聯從東、西兩面夾擊德國。文中還提到了“末次世界大戰”：“假如上面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推測成立，則人類恐難避免另一次世界大戰，雖然也許是最後一次。不言而喻，是次大戰極可能是以美、蘇、英、法、德為一方，以中國為另一方……中國的領導人曾一再保證永遠不做‘超級大國’，然而如果形勢有變，為了發展本身的民族工業以同外國競爭，為了控制勢力範圍以輸出商品、資本，為了解決難以負擔的膨脹的人口壓力，將來中國是否會束手待斃而不對外擴張，就斷難預料了。屆時，拿破崙所預言的東亞睡獅果真醒來，世界將為之一動，全球也許會真正驚呼‘黃禍’ (The Yellow Peril) 了！”

這種看法並非聳人聽聞的東方夜譚。歷史是不能戴著玫瑰色眼鏡來觀察的，數千載的人類文明史正是以暴力為媒介，揮灑著億萬民眾的血淚汗而行進的。“成則為王，敗則為寇”，“一將功成萬骨枯”，“強權就是公理”，“歷史是由勝利者寫的”，這些俗語之所以千百載流傳未衰，不為無因。或謂“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其實這句“最高指示”下還應加上“要侵略”，因為革命與侵略都是為了改變所有權，只不過內外有別。就這個意義說，可以大膽地講一句：

革命，是對內的侵略；

侵略，是對外的革命！

領袖的使命

筆者對中國民主化前景的看法，可能會被一些人認為過於悲觀，而另一些人則會斥之為狂妄反動。不過，任何結論都有待“歷史老大爺”的公正審判。

既然“一黨專制”仍將在中國長期存在，那中國億萬百姓豈非要永做“順民”？如作這般理解，就把問題簡單化了。任何一個運動，都有左、中、右，中間是絕大多數。中國少數精英分子為了祖國的民主自由，拋頭顱灑熱血，被捕判刑流亡，他們的拓荒播種精神永遠值得敬仰。中國還有少數學閥、文痞為了個人的命、位、名、利而不惜替專制政治大唱讚歌，他們將與那些黨棍、軍閥、政客一道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可是那些絕大多數的億萬民眾，他們固然嚮往民主自由，但未能犧牲生命、家庭而為之搏鬥，他們還要活下去，怎麼辦？總不能讓他們成天把“鬥爭”的弦擰得緊緊的，況且革命的形勢也非天天有，但又不能讓他們渾渾噩噩，或一天到晚生活在絕望之中。如果能把真正的科學結論告訴人民，人們在等待之中或可見一絲曙光，即使自己等不到也會為後代造福。而他們的日常工作，只要是有利於發展祖國的經濟、提高人民的文化，都是對中華民族民主事業的貢獻。

有鑑於此，中國民主運動的領袖們既要善於在急風暴雨中逆浪而進，又要善於在風平浪靜時默默耕耘。像嚴家其、陳一諮等先生，不管他們是否願意或意識到，歷史已把他們推到中國海外民主運動領袖的行列。他們肩上的責任比前重得多，他們言行的影響也同從前發表個人意見大不相同了。因此，需要揚長避短，克服自身原來從事專業的局限性，藉助於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對中國的歷史傳統及當前局勢作更加深入、冷靜的分析。

這裏，切忌因客居異國而急躁。從歷史看，一些海外領袖雖有治病的萬應良方，但用來指導本國的運動往往不靈，例如馬克思、列寧、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王明等等，無不如是，其因往往在於脫離本國歷史，脫離本國實際。不過，筆者深信，只要海內外炎黃子孫齊心協力，堅持切實的工作，中國民主化的過程是可以縮短的。

（原載《爭鳴》1992年5月號；另刊於《中國歷代之興治盛衰亂亡》，香港學津書店2000年增訂版）